

《臺灣學研究》
第 17 期，頁 151-160
民國 103 年 10 月
國立臺灣圖書館

書評：松田京子，《帝国の思考：日本「帝国」と台湾原住民》（南山大学学術叢書）
（東京：有志舎，2014），271 頁。

陳偉智*



*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學程兼任講師，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 一、殖民主義文化史研究的新作
 - 二、各章內容介紹
 - 三、議題與討論
-

一、殖民主義文化史研究的新作

日本南山大學人文學部教授松田京子在 2003 年出版《帝國の視線：博覽會と異文化表象》一書之後¹，將十年來進一步的研究成果集結成書，做為南山大學學術叢書系列之一，出版了《帝国の思考：日本「帝国」と台湾原住民》。前者是以環繞著 1903 年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為中心的分析，新的力作則是以臺灣原住民的再現政治為主題，擴大分析近代日本殖民帝國主義的文化政治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型態，特別是其異己統治的再現策略。

晚近的殖民地研究的特色之一，是在既有的殖民帝國主義的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支配之外，也注意到了殖民帝國主義同時也是一種文化支配的形式。換言之，殖民帝國主義的歷史現象既是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同時也是社會史與文化史。松田京子此書，屬於殖民帝國主義的文化史的研究，透過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不同歷史階段，在新聞報導、蕃人內地觀光、人類學知識、歷史學研究、法律論述、理蕃政策、博覽會再現、藝術評論、以及自然保護論述與餘暇旅行活動種種的事件、媒介、制度以及論述生產機制，分析臺灣原住民在統治政策、文化活動、學術論述再現的過程中，被對象化的同時也被客觀化，形成了身分邊界與階序設定清楚的社會位置。

本文首先介紹此書各章內容大要，接著進一步討論其貢獻以及相關的議題。本書各章標題如下：

序 章

第一章 戰爭報導中的臺灣：臺灣領有戰爭與臺灣原住民

第二章 作為臺灣原住民教化政策的「內地」觀光：以第一回「內地」觀光（1897 年）為中心

第三章 殖民主義與歷史的再現：伊能嘉矩的調查實踐與「臺灣史」記述

第四章 「帝國臣民」的外緣與「帝國」的學知：領臺前期有關臺灣原住民法律論述的位置

¹ 松田京子，《帝国の視線—博覽會と異文化表象—》，（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

- 第五章 從臺灣原住民在法律上的位置來看原住民政策的展開
- 第六章 「五年理蕃事業計畫」的暴力：作為「境界線」的隘勇線
- 第七章 「展示」人類與殖民再現：以一九一二年拓殖博覽會為中心
- 第八章 一九三〇年代對臺灣原住民的統治實踐與再現策略：「原始藝術」論述的展開
- 第九章 臺灣國立公園與臺灣原住民：殖民地旅行的展開與原住民再現
- 第十章 「原始藝術」論述與臺灣原住民：「起源」論述與殖民主義
- 終章

二、各章內容介紹

「序章」介紹本書的問題意識，《帝國的「思考」》一書，依循著薩伊德(Edward Said)《東方主義》以來學界對帝國主義關於知識與權力互相支持研究的啟發，促進了以異文化研究為主的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對各自學科知識基礎的反省。² 在這樣的學術脈絡中，松田將關於近代日本「帝國」的問題，從認識論的觀點來考察論述殖民地的種種「帝國」的學知。日本的殖民地支配，臺灣原住民作為「帝國」學知的對象，在具體的統治實踐的場合中，人種主義與殖民主義常常互相交織。相對於日本統治初期殖民者針對漢人社會強調的「同文同種」言說，臺灣原住民的存在，在「同文同種」論的射程之外，殖民者一方面否定其與自己的同時代性，同時形成與殖民者自己對照的異己。在考察「帝國」問題之際，松田更指出伴隨著權力的不均衡而來的直接、間接的暴力的行使問題，不能輕易忽略。作為「思索與實踐交會點的原住民統治」（頁7），本書探討日本對臺灣原住民的殖民統治的歷史時，尖銳地呈現了殖民主義的暴力性與矛盾，並追問「知識」與「文化」，在殖民地支配的狀況下所具有的彼此交織互涉的政治性。

「第一章 戰爭報導中的臺灣：臺灣領有戰爭與臺灣原住民」分析1895年臺灣割讓後在日本統治臺灣最初遭遇武裝反抗的戰爭報導中，日本媒體對臺灣以及臺灣人的再現，從媒體對臺灣人的再現中區分漢民族與臺灣原住民的境界線，並就其中日本人作為「解放者」的自我形象的塑造，進一步分析這些對臺灣人再現

²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1978), 以及稍後的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1993). 薩伊德是後殖民研究重要的文學批評理論家，其影響不只在比較文學或是文化研究的學術領域，也深刻影響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歷史研究趨勢，以及更一般性的文化史研究的問題意識。

的戰爭報導與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的關連。

「第二章 作為臺灣原住民教化政策的「內地」觀光：以第一回「內地」觀光（1897年）為中心」討論作為臺灣原住民教化措施一環的原住民「內地」觀光的策略，在統治初期以撫墾署為中心的「綏撫」政策中的位置。就第一回內地觀光的進行過程、總督府的綏撫政策構想、內地觀光的過程、日本國內的反應、以及參與的原住民頭目們在旅行中與事後反應的分析，指出內地觀光教化政策在意圖與效果之間的落差。此章並試圖從殖民者留下的原住民的經驗與反應的紀錄，重建從原住民的立場對於此一內地觀光事件的理解。

「第三章 殖民主義與歷史的再現：伊能嘉矩的調查實踐與「臺灣史」記述」以伊能嘉矩為中心，分析統治初期關於臺灣原住民的調查與人類學、歷史學的知識生產。伊能嘉矩的族群分類知識，透過田野調查的具體性與人類學知識科學性的擔保，提供了關於臺灣原住民的基礎性的資料。松田指出伊能的臺灣史知識是建立在種族生存競爭的社會進化的文明發展論述，一方面批判了既有日本統治以前的「中華文明」的論述，同時設定了新來的統治者（即日本人）擔當真正文明化使命的位置。

相對於伊能嘉矩對臺灣原住民以教化為主的文明化論述，在統治初期綏撫主義的失敗中逐漸轉而形成以討伐為主，試圖使原住民徹底服從化的，由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提出的威壓主義政策，以及相關的在法律上關於臺灣原住民在帝國內的法律身分位階上的法律知識的生產，則是「第四章「帝國臣民」的外緣與「帝國」的學知：領臺前期有關臺灣原住民法律論述的位置」與「第五章 從臺灣原住民在法律上的位置來看原住民政策的展開」的分析主題。臺灣總督府的原住民統治政策中，文明化教化與武力討伐，成為此後雙軌交錯的兩端。

「第六章 「五年理蕃事業計畫」的暴力：作為「境界線」的隘勇線」在前述章節的基礎上，分析在1900年代中期形成的「五年理蕃事業計畫」背後的關於對臺灣原住民的「分類」知識，與從族群分類發展到相應的臺灣原住民統治政策的轉變。這些原住民身份分類知識包括人類學知識的原住民族群分類、整體性的臺灣原住民在帝國法律中的身分位階的近代法律知識對統治對象的分類、在理蕃政策調整中對馴服與否的「南蕃/北蕃」區分，以及在武力討伐中透過隘勇線將臣服與否加以空間化所區分出來的「線內/線外」。「分類」知識中內含的暴力性，透過臺灣總督府「五年理蕃計畫」的軍事討伐，外顯性地呈現出來。

「第七章 「展示」人類與殖民再現：以一九一二年拓殖博覽會為中心」則

以在「五年理蕃計畫」進行過程中，於 1912 年在東京主辦的「拓殖博覽會」為中心，分析日本「帝國」對臺灣整體的再現，以及正在進行中的理蕃計畫的成果。1912 年「拓殖博覽會」以當時日本的五個「殖民地」（臺灣、朝鮮、樺太、關東州、北海道）出品展示為中心，除了呈現各地產業與人文發展進步的現狀外，並設置了「土人部落」，在博覽會場中展示來自臺灣、樺太、北海道三地共 17 名的「土人」，提供帝國範圍內殖民地現生人種的活生生的生活展示。現生土人的展示，除了有日本國內人類學界的協助提供學術性的保證外，更重要的是活人展示，讓宗主國的社會一方面降低對以往在緘首的印象中所形成的殖民地原住民野蠻性的疑慮，同時也是對原住民統治的文明化成果的自我讚許。

1910 年代五年理蕃計畫結束後，日本臺灣原住民統治政策朝著「農業化」、集團移住、以及蕃童教育所的普及發展，更在 1930 年霧社事件的衝擊後，朝著「蕃地內地化」（頁 150）的方向展開。透過生活改善等政策，介入原住民日常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在朝向蕃地內地化，原住民日常生活開始呈現了巨大變遷的同時，在 1930 年代也出現了過渡介入的批判，並形成了應將原住民文化的一部份，訴諸「原始藝術」加以保護的論述。不論是統治初期的文明化教化的主張，或是 1930 年代在過渡教化產生的社會變遷導致原住民固有文化喪失的危機中形成的文化保護論述，皆是一種來自原住民社會的外部，來自日本人的，建立在「差異」的前提上的論述。統治初期，是要施以文明化教化或透過武力征服加以去除的差異，到了 1930 年代則成為具有文化本真性（cultural authenticity）的價值並處於逐漸喪失的危機中，必需要加以保存的差異。

「第八章 一九三〇年代對臺灣原住民的統治實踐與再現策略：「原始藝術」論述的展開」、「第九章 臺灣國立公園與臺灣原住民：殖民地旅行的展開與原住民再現」以及「第十章 「原始藝術」論述與臺灣原住民：「起源」論述與殖民主義」，針對 1930 年代興起的臺灣原住民保留了文化本真性的論述中，分別分析了關於「原始藝術」的藝術論述、美術中的原住民形象、1935 年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展示的原住民舞蹈與歌謠作為代表臺灣的文化項目、部落生活改善中應要保留的儀式的討論、作為觀光資源的原住民文化以及國立公園設立、博物館物質文化收藏與保留的原住民文化、作為史蹟、天然記念物指定的文化財、以及作為「原始藝術」的原住民固有文化等種種的以「差異」的保存，提供文化價值資源的論述、機構、制度與政策。

這些文化保存的論述不單單只是在殖民地臺灣內部的事件，同時也跟日本國

內在當時興起的重新定義日本的日本文化民族主義發展有關，被認為保留在臺灣原住民現生生活中的「原始藝術」，成為日本當時國內學術界文化界在論述日本古代史以及原始藝術與工藝起源類型時的參考點。換言之，臺灣原住民的「現在」在原始藝術與工藝論述的知識生產中，透過「原始的一樣性」預設，被等同於數千年前的「日本」（頁 252）。在生活現場的空間的距離之外，臺灣原住民的歷史性，在「原始藝術論」的時間距離的操作中被否定。

最後在「終章」中，松田指出日本殖民地統治，人種主義的思考樣式留下了巨大的痕跡。從統治初期以生存競爭的文明化理論中的強調以「身體、生物性的差異的體質人種主義」，到後期的強調「文化上的差異的文化人種主義」，都是以差異為前提，並否定臺灣原住民的同時代性的人種主義力學的表現形式。而不同的人種主義力學的表現形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雖然有其強弱與力點配置的變化，但都是「帝國的思考」的核心。

三、議題與討論

殖民帝國的支配，不單單只是政治軍事上的征服以及經濟層面的剝削，同時也在象徵層面上，在生產了被殖民者在帝國內的社會位置同時，也設定了主體自我再現的可能性範圍。在殖民地統治的理蕃軍事征服的直接暴力之外，內在於種種政策與制度實踐理略中的人群分類與人群文化特質的論述，更是認識論層面上的象徵暴力。

松田在本書中指出，日本臺灣殖民地統治的過程中的臺灣原住民，在身分上被編入成為帝國範圍內臣民主體權利不均等階序分佈的底層。在空間上，是被圈包居住在蕃界特別行政區域內的差別統治下的社群；在時間上，或作為文化進化發展的對立面、或作為保留文化本真性的人類社群，被當成了雖然與當下現代時間並存並置，卻代表著「過去」的時間。³殖民主義文化政治中針對原住民身分設定的不均等並具有階序性的時間—空間的操作，其暴力性的呈現，則具有表裡兩種層次：一方面合理化了從牡丹社事件到五年理蕃計畫到霧社事件期間進行武力討伐具體的暴力之施行，同時，雖然歷經了從體質的到文化的人種理論在論理

³ 在人類學知識，或是更廣義的文化論述，在異文化認識或是專業的學科知識生產上，注意到認識主體與被認識的對象之間，在時間上並存的同時代性的否定，晚近的一些討論，如松田京子此書，以及其他類似的研究，可以說都受到了人類學家 Johannes Fabian 經典著作的啟發。見 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上的轉變，但其內含的認識論的象徵暴力則持續地延續。

在原住民統治的政策、知識、與文化概念的交織與沿革的歷史過程中，松田的研究指出了重層的暴力性（武力的與象徵的）與不同形式的人種主義（生物體質的與文化的）在不同時期的配置與轉變。透過這樣的視角，將原來分屬不同範疇的事件、現象與制度串連起來，使其研究成果具有提供我們整體性瞭解「帝國的思想」的貢獻。⁴同時松田也指出了在 1920、30 年代，是殖民地的原住民統治在論述上有了從體質到文化，政策上從威壓到保護的歷史轉變，但是分類與時間的政治仍然持續運作。原住民仍然是法律與社會身份甚至空間上的異己，仍然是被設定了與當下現在並存但是卻代表著過去的時間。

除了考察來自於殖民者（官僚、學者、文化人、媒體等）所共同建構的臺灣原住民的異己形象外，松田在此書中，也試圖在重疊的文本中，挖掘原住民的聲音。雖然殖民者的政策與論述，設定了原住民在殖民統治時期的社會位置，但這種外塑的「主體」，在實踐的過程中，仍是遭遇到被當成對象的原住民的協商與反抗，其形式有語言上的、甚至武力的。比如第二章提到的「前山蕃族總土目」タイモミツセル（代麼密鮮、大麼密鮮）（頁 57）在參加 1897 年第一回內地觀光前後，在殖民地官員的調查書內，留下了具體的聲音，表達了其希望總督府協助發展農業的願望與在內地觀光時卻參觀軍事設施，以及原先官員說論不可殺人卻下賜日本刀等種種矛盾而生的不信任感，甚至對總督府的政策提出質疑。從其質疑的聲音中，也凸顯了內地觀光策略以及初期綏撫政策的破綻。三年後，他在一次總督府對襲擊腦寮的大崙炭原住民的包圍討伐中負傷戰死。

⁴ 日本的臺灣原住民統治與論述，晚近也有許多不同範疇與議題的研究成果，例如政策史、教育史、法律史、人類學史等。松田的貢獻在於透過「暴力性」（武力、象徵）與「學知」（論述、文化概念），將不同範疇與領域的議題整合在一起，同時注意到並時性的聯繫與貫時性的演變，提供了整體性的視野。政策史的研究，參見藤井志津枝，《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臺北：文映堂，1997），以及中村勝，《台湾高地原住民の歴史人類学—清朝・日本初期統治政策の研究》，（東京：綠陰書房，2003）。法律史的研究，參見王泰升，〈日治時期高山族原住民族的現代法治初體驗：以關於惡行的制裁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40（1）：1-98，2011。以及黃唯玲，〈日治時期「平地蕃人」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1895-1937）〉，《臺灣史研究》19（2）：99-150，2012。教育史，見松田吉郎，《台湾原住民と日本語教育—日本統治時代台湾原住民教育史研究—》，（東京：晃洋書房，2004）。北村嘉惠，《日本植民地下の台湾先住民教育史》，（札幌：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8）。人類學史，例如笠原政治，〈台湾原住民族を俯瞰する—伊能嘉矩の集団分類をめぐって〉，《台湾原住民研究》16：3-31，2012。坂野徹，〈漢化・日本化・文明化—植民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人類学研究〉，《思想》949：42-69，2003，以及《帝国國日本と人類学學者 1884-1952 年》，（東京：勁草書房，2005）。山路勝彦，《台湾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4），以及山路勝彦編，《日本の人類学：植民地主義、異文化研究、學術調査の歴史》，（兵庫：關西学院大学出版会，2011）。

相對於第二章出現的原住民的聲音，其他的章節則是以統治側或是日本人側的政策與論述的分析為主，這或許是因為史料所限。但這也暗示了在日本的臺灣殖民地統治漸次展開後，透過政策與論述所設定的原住民社會位置與文化階序，將重新塑造「原住民」的身份，以及原住民發聲的方式了。的確，主體性的形成，總都不是先驗的，而是在歷史過程中社會地形成，文化機制則影響了發聲的方式與可能性。經歷了五十年的殖民地統治，臺灣原住民社會也產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從以部落或是延伸性的社會組織的認同，逐漸形成了跨族的泛原住民認同。發聲的方式，也從原先的口語傳統，獲得了雖然是外來者的語言，卻是跨族溝通的媒介。對於社會與政治的概念，到了殖民地統治結束之後，甚至產生了跨越部落與各族的族群界線，形成了初步的原住民族的「民族」政治認同。⁵而這些在殖民地時代，透過松田所言的「帝國的思想」產生的效果，在戰後的國民政府統治時期至今，也有所繼承與發展。⁶

松田在本書最後，提起了歷史意識與「遺忘」的課題。透過本書，松田試圖與當代日本的歷史意識對話，提醒戰後歷史意識設定了1945年8月15日的斷點，作為戰後和平主義日本的起點，卻從而遺忘了先前曾經是殖民地帝國的歷史觀。為了對抗這樣的「遺忘」歷史觀，不得不努力地提起在殖民地支配中的暴力的痕跡（頁263）。⁷面對如此誠懇的探究在日本統治臺灣過程，在「帝國的思想」中，建構了什麼樣的臺灣原住民的形象與社會位置，而其中又內含了什麼樣的知識、文化與制度的暴力性的作品時，雖然意識到其設定的讀者是當代日本的社會，但總不免令人進一步想要探究，即便是內含具體的與象徵的暴力性的知識與制度中，終究也形成了臺灣原住民的主體，到了1945年之後，又是什麼樣的歷史呢？在日本的「帝國的思想」中，形成了臺灣原住民的整體的政治社會身份範疇，到

⁵ 1940年代末期，原住民政治菁英，如泰雅族的樂信瓦旦（林瑞昌）以及鄒族的吾雅·雅達烏猶卡那（高一生）已經有很清楚的泛原住民族群的「民族」認同，並曾提出原住民族自治的政治主張。但在1952年以「高山族匪諜案」遭難，死於白色恐怖中。相關研究參見吳叡人，〈「臺灣高山族殺人事件」：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事件之初步重建〉、范燕秋，〈樂信·瓦旦與二二八事件之中泰雅族的動態〉，收於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二二八紀念館主辦，〈「紀念二二八事件6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及臺北二二八紀念館，2007）。

⁶ 從「地方化」的過程，來看戰前與戰後臺灣的原住民統治與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及其延續性，見松岡格，〈台灣原住民社會の地方化：マイノリティの20世紀〉，（東京：研文出版社，2012）。

⁷ 這樣的看法，同樣是臺灣原住民研究者的中村平，在一篇書介中，也特別加以強調，並認為直面曾經存在過的殖民地統治的暴力性，是追問與脫殖民化過程等相關問題，至為重要之事。見中村平，〈日本「帝國の思想」を記述する中で反照的に浮かび上がる台湾先住民の主体性—21世紀にも存在する日本植民主義的思考との連続性の上でまず読まれるべき書〉，《図書新聞》第3174号，2014年9月13。

了「民國的思考」中，不論是 1987 年前的戒嚴的「民國的思考」，或是之後的民主化的「民國的思考」中，或是中國民族主義或是臺灣民族主義的「國民國家的思考」中，又是內含了何種知識、文化與制度的暴力性呢？而原住民的主體性，又是何種建構呢？同時，在此一過程中建構的主體，又將如何發聲呢？作為臺灣的讀者，我們必須要對抗的，是何種歷史意識的「遺忘」呢？

